

# 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规模的统计分析<sup>①</sup>

张小虎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 郑州市 450000)

关键词: 关中地区; 新石器文化; 发展规模; 统计分析

摘要: 目前利用统计方法分析区域古文化发展规模的研究还比较少。通过对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遗迹(灰坑)的统计分析, 本文发现, 新石器时代以来关中地区文化发展存在着阶段性和区域性差异: 一方面, 关中地区新石器文化发展规模存在着阶段性起伏, 其中龙山早期存在着一个较为显著的低潮阶段; 另一方面, 关中东、西部发展的区域差异出现于仰韶文化时期, 并且一直延续到了龙山文化时期。此外, 关中周围地区文化发展同样也存在着阶段性起伏的特点, 并且似乎还有着相邻区域文化发展此起彼伏的现象。

**Key words:** Guanzhong Region; Neolithic cultures; development scale; statistic analysis

**Abstract:** Presently studies into the development scale of ancient regional cultures by means of statistic analysis seem to remain in a small number. By using this method to analyzing vestiges (ash-pits) on Neolithic sites, the present paper discovers that from the Neolithic Age, the cultures in the Guanzhong Region featured notable stage-marking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On one hand, there existed stage-marking undul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olithic cultures in the Guanzhong Region, especially the early Longshan Culture was at a marked low ebb; on the other, regional differences between western and eastern Guanzhong merged in Yangshao Culture times and continued down to the Longshan Culture period. Furthermore, stage-marking undulations existed also in the developmental course of the surrounding areas of Guanzhong, which seems to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the phenomenon as one fell and another rose among the cultures of adjacent areas.

陕西中部的关中地区, 南依秦岭, 北止北山丘陵(陕北黄土高原), 西起宝鸡, 东抵黄河, 是一个西部缩窄闭合、向东开阔的盆地平原, 故又称关中平原或关中盆地。其中, 大致又以西安—咸阳为界, 以西为关中西部, 以东为关中东部。

作为我国较早开展考古工作的一个地区, 关中地区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十分密集,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学术界对关中地区新石器文化已有一定了解。然而, 由于各种原因, 目前对关中地区新石器文化不同阶段的具体状况却缺乏进一步的详细了解, 特别

是在不同阶段文化的发展规模方面。

鉴于关中地区经过考古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数量较多、考古资料公布已较为充分, 利用统计方法, 通过对已有资料的分析, 本文尝试量化评估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阶段性发展规模。关中地区新石器文化发展连续而阶段性差异显著、容易识别的特点, 也为本文的分析奠定了良好基础。

## 一、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灰坑的统计分析

对于那些不是有特定学术目标, 即不是

<sup>①</sup> 本研究受到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资助课题“中原腹地文明化进程中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互动关系研究(项目编号 Q2012-06)”的资助, 还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项目(项目批准号 10XJC780001)的成果之一。

刻意要去找某些特定遗存的考古项目，发掘中出土什么文化遗存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随机性。从概率的角度来看，遗址、遗迹数量越多，被发现的机率就越大。正是由于考古发掘的随机性，发掘出土的文化堆积（包括遗迹、遗物的种类、数量以及文化层的厚度等）的多少，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地点古文化的发展规模。基于这一点，我们来考察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不同阶段文化发展的具体规模。

通常，考古学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一个完整的聚落遗址包括了房址、窖穴、垃圾堆（灰坑）、墓葬、陶窑、广场、壕沟等遗迹，并且在一定时间尺度内这些遗迹现象是共存的。然而受文化遗存分布、保存状况及发掘规模、考古发掘的随机性等因素影响，在实际发掘中并不总是能观察到所有种类的遗迹，而灰坑则是考古发掘中最常见、最普通的遗迹。作为新石器时代最普通的遗迹，一个遗址中灰坑的数量通常与人类活动的性质、活动强度以及持续时间等因素密切相

关，因此遗址的灰坑数量可以反映区域人类活动的强度，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反映人类活动规模的代用指标。文化规模的差异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因此，为了便于不同时代之间的比较，这里选择灰坑作为统计、比较的对象。

这里先简要介绍本文对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阶段的划分。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共有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三个大的阶段，其中仰韶文化又分为早（即半坡类型）、中（即庙底沟类型）、晚（即半坡晚期类型）三期，龙山文化又分为早（即庙底沟二期文化）、晚（即客省庄文化）两大期，加上前仰韶时期的老官台文化，这样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一共有6个大的阶段。下表为关中地区经过较大规模考古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灰坑的数量统计表。（表一）在表一的基础上，又对东、西部灰坑的数量、比例及出现频率和发掘面积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统计分析，形成了表二、表三、表四和图一、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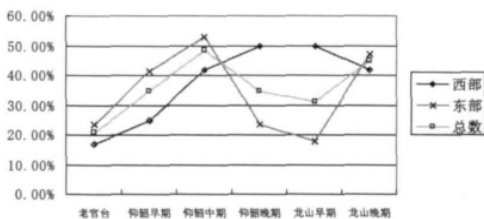
表一 关中地区已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灰坑统计表

地区	遗址	老官台文化	仰韶早期	仰韶中期	仰韶晚期	龙山早期	龙山晚期	发掘面积 (m <sup>2</sup> )
关中西部	陇县原子头 <sup>[1]</sup>	4	24	25	53	5		3800
	千阳丰头 <sup>[2]</sup>		有	有	108			2500
	麟游蔡家河 <sup>[3]</sup>					2	2	150
	宝鸡关桃园 <sup>[4]</sup>	147	6		73			3900
	宝鸡福临堡 <sup>[5]</sup>			47	90			1344
	宝鸡石嘴头 <sup>[6]</sup>				25	1	18	2960
	扶风案板 <sup>[7]</sup>			32	68	65		4532
	岐山双庵 <sup>[8]</sup>						49	2000
	岐山王家嘴 <sup>[9]</sup>			10				307
	凤翔大辛村 <sup>[10]</sup>						22	575
	武功浒西庄 <sup>[11]</sup>					35		1204
	武功赵家来 <sup>[12]</sup>					3	30	582

续表一：

地区	遗址	老官台文化	仰韶早期	仰韶中期	仰韶晚期	龙山早期	龙山晚期	发掘面积 (m <sup>2</sup> )
关中东部	蓝田泄湖 <sup>[13]</sup>		7	3	6	4	9	500
	高陵东营 <sup>[14]</sup>			21			50	2000
	长安客省庄 <sup>[15]</sup>						43	2494
	临潼零口 <sup>[16]</sup>	1	48		11			470
	临潼白家村 <sup>[17]</sup>	49						1366
	临潼北牛 <sup>[18]</sup>			8			4	407
	临潼姜寨 <sup>[19]</sup>		338	5	102		58	17084
	临潼康家 <sup>[20]</sup>						83	1630
	渭南北刘 <sup>[21]</sup>	27		51				1518
	华县泉护村 <sup>[22]</sup>			271	≥2	14		5855
	华县梓里 <sup>[23]</sup>		3				24	475
	华阴西关堡 <sup>[24]</sup>			31				500
	华阴南城子 <sup>[25]</sup>			14				225
	华阴兴乐坊 <sup>[26]</sup>			52				1000
	华阴横镇 <sup>[27]</sup>		30			16	19	1000
	合阳吴家营 <sup>[28]</sup>			15				2000
华县元君庙 <sup>[29]</sup>	3	2					90	
总数	29	231	473	570	538	145	411	62468

注：1. 零口类型归入仰韶早期，福临堡二期遗存归入仰韶中期。下同。  
 2. 千阳丰头遗址还有仰韶早中期灰坑 66 个，由于具体数量不明，这里不予计算在内。



图一 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不同阶段灰坑出现频率 (据表三)

考察关中地区目前已发掘遗址的发掘缘起，我们发现仅有白家、姜寨、康家、赵家来、许西庄、案板等遗址的发掘属于有特定学术目标的考古发掘行为。也就是说，目前关中地区大部分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行为多是配合基本建设项目的结果，多不具有十分明确的学术目标，因此，其所反映的状况更能揭示当时的实际情况。

表二 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灰坑数量、比例及发掘面积 (据表一)

地区	遗址数量	老官台文化	仰韶早期	仰韶中期	仰韶晚期	龙山早期	龙山晚期	发掘面积 (m <sup>2</sup> )
西部	12	151 (65.4%)	30 (6.3%)	114 (20%)	417 (77.5%)	111 (76.6%)	121 (29.4%)	23854 (38.2%)
东部	17	80 (34.6%)	443 (93.7%)	456 (80%)	121 (22.5%)	34 (23.4%)	290 (70.6%)	38614 (61.8%)
总数	29	231	473	570	538	145	411	624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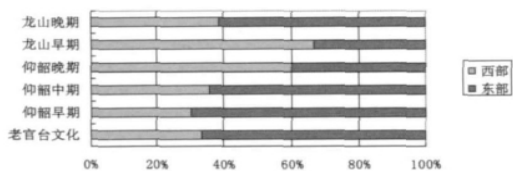
表三 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灰坑出现次数及频率（据表一）

地区	老官台文化	仰韶早期	仰韶中期	仰韶晚期	龙山早期	龙山晚期	遗址数量
西部	2 (16.7%)	3 (25%)	5 (41.7%)	6 (50%)	6 (50%)	5 (41.7%)	12
东部	4 (23.5%)	7 (41.2%)	9 (52.9%)	4 (23.5%)	3 (17.6%)	8 (47.1%)	17
总数	6 (20.7%)	10 (34.5%)	14 (48.3%)	10 (34.5%)	9 (31%)	13 (44.8%)	29

注：1. 本表统计包括了千阳丰头遗址仰韶早中期；2. 出现频率由出现次数与遗址数量比值得出。

表四 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发展的东、西差异（据表一）

地区	老官台文化	仰韶早期	仰韶中期	仰韶晚期	龙山早期	龙山晚期	遗址数量
西部	2 (33.3%)	3 (30%)	5 (35.7%)	6 (60%)	6 (66.7%)	5 (38.5%)	12
东部	4 (66.7%)	7 (70%)	9 (64.3%)	4 (40%)	3 (33.3%)	8 (61.5%)	17
总数	6	10	14	10	9	13	29



图二 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发展的东、西差异(据表四)

为了检验本文的统计结果是否真实，这里再采用一种统计方式。统计原则是，遗址中只要出现某一时期的遗迹或有遗物而无遗

迹，都算该遗址存在某一期遗存。由此，我们得到了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各期遗存出现情况统计表。（表五）在表五的基础上，我们又计算了各期遗存的出现频率，即表六、表七和图三、图四。我们注意到，就表三与表六反映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出现频率来看，两者反映的趋势基本一致，说明灰坑统计的结果是真实可信的。

表五 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出现频率统计表

区域	遗址	老官台	仰韶早期	仰韶中期	仰韶晚期	龙山早期	龙山晚期
西部	陇县原子头	√	√	√	√	√	
	千阳丰头		√	√	√		
	麟游蔡家河					√	√
	宝鸡北首岭	√	√	√	√		
	宝鸡高家村	√	√		√		
	宝鸡关桃园	√	√		√		
	宝鸡福临堡		√	√	√		
	宝鸡石嘴头			√	√	√	√
	宝鸡纸坊头			√	√		
	岐山王家嘴			√	√		
	岐山双庵						√
	扶风老堡子			√	√	√	√

续表五:

区域	遗址	老官台	仰韶早期	仰韶中期	仰韶晚期	龙山早期	龙山晚期
西部	扶风案板			√	√	√	
	凤翔大辛村						√
	凤翔水沟			√	√		√
	眉县白家			√	√		
	眉县霸关口			√	√		
	武功浒西庄			√		√	
	武功赵家来			√		√	√
东部	高陵东营		√	√			√
	高陵杨官寨			√	√		
	高陵马家湾						
	蓝田新街				√	√	
	蓝田泄湖		√	√	√	√	√
	西安半坡	√	√	√	√		
	西安鱼化寨	√	√	√	√		
	西安米家崖		×		√	√	√
	长安客省庄			√			√
	长安花楼子				√	√	
	临潼白家	√					
	临潼康家						√
	临潼姜寨		√	√	√		√
	临潼北牛			√			√
	临潼零口	√	√		√		
	渭南北刘	√		√			
	渭南史家		√				
	华县泉护村			√	√	√	
	华县元君庙	√	√				
	华县梓里		√				√
	华阴兴乐坊			√			
	华阴横镇		√			√	√
华阴西关堡			√				
华阴南城子			√				
潼关南寨子		√	√				
东部	白水河			√	√		√
	合阳吴家营		√				
总数	46	10	18	29	25	13	18

注: 西安鱼化寨、潼关南寨子虽有龙山文化遗存, 由于具体期别不明, 本表未包括在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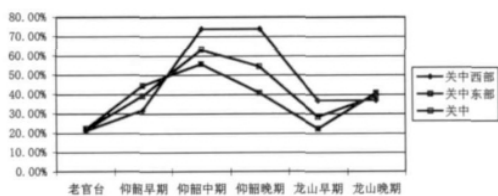
表六 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出现次数及频率统计表（据表五）

区域	老官台	仰韶早期	仰韶中期	仰韶晚期	龙山早期	龙山晚期	遗址数量
关中西部	4 (21.1%)	6 (31.6%)	14 (73.7%)	14 (73.7%)	7 (36.8%)	7 (36.8%)	19
关中东部	6 (22.2%)	12 (44.4)	15 (55.6)	11 (40.7)	6 (22.2)	11 (40.7)	27
总数	10 (21.7)	18 (39.1)	29 (63.0)	25 (54.3)	13 (28.3)	18 (39.1)	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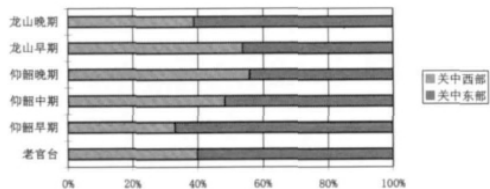
注：频率百分比由遗址数量与出现次数的比值得出。

表七 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发展的东、西差异（据表五）

区域	老官台	仰韶早期	仰韶中期	仰韶晚期	龙山早期	龙山晚期	遗址数量
关中西部	4 (40.0)	6 (33.3)	14 (48.3)	14 (56.0)	7 (53.8)	7 (38.9)	19
关中东部	6 (60.0)	12 (66.7)	15 (53.6)	11 (44.0)	6 (46.2)	11 (61.1)	27
总数	10	18	29	25	13	18	46



图三 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出现频率图（据表六）



图四 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发展的东、西差异（据表七）

接下来将灰坑作为区域人类活动强度的指标，我们通过对表二、表三、表四和表六、表七的分析来讨论关中地区新石器文化发展规模的阶段性变化。

作为关中地区目前最早的新石器文化的老官台文化，遗址数量稀少，目前仅发现30多处<sup>[30]</sup>。从灰坑的数量、出土频率与面积的关系来看，东、西部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但结合其他状况（见表四、表七）分析，目前还难以确定关中东、西部是否存在较为显著的区域差异。

进入仰韶文化阶段，关中东、西部文化

发展开始出现了较为显著的区域差异，作者已有文章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述，这里只简单介绍其结论<sup>[31]</sup>。仰韶早期，虽然已发掘遗址数量较少，但从已有现象看，关中东部文化发展规模要大于西部，遗存的出现频率要略高于西部；仰韶中期，关中东、西区域差异开始显著，这一时期东部文化的发展规模无疑远超西部，遗迹的出现频率和数量都明显超过了西部；仰韶晚期，关中西部文化发展规模显著超过了关中东部，一方面遗存的出现频率高，另一方面与发掘面积相比，灰坑的数量也明显超过东部，而东部进入了一个相对低潮阶段，遗存的出现频率和数量都显著下降。

龙山文化时期，关中地区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统计结果显示（见表三、表六），龙山早期，关中地区文化发展出现了一个低潮阶段，遗存的出现频率较之前、之后期显著降低，且灰坑的数量较之前、之后期都显著减少；并且可能还存在区域差异，西部文化发展可能要好于东部，遗迹的出现概率明显高于东部。经过了龙山早期的低潮后，龙山晚期关中地区文化又有了进一步发展，遗迹的出现频率和数量都明显增多，表明这一时期人类活动有所增强，东、

西部灰坑的数量与发掘面积基本一致,从目前已有的资料尚难以看出关中东、西部是否存在较为显著的区域差异。

此外,统计结果显示(见表二、表三),在将灰坑作为人类活动强度的代用指标的情况下,与仰韶文化相比,关中地区龙山时代灰坑的出土数量和频率有所下降。这可能意味着龙山时代关中地区人类活动的强度有所下降,文化发展的步伐明显放慢。与此相反的是,龙山时代特别是龙山晚期,郑洛地区人类活动的强度明显增强,遗址数量急剧增加,规模扩大,出现了数量较多的大型遗址<sup>[32]</sup>。这可能是两个地区差异化发展的社会物质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统计结果与现有的认识、资料存在不完全一致之处。这里以考古资料较多的关中西部为例,本文对于关中西部仰韶文化的分析结果与最近的新认识比较一致<sup>[33]</sup>,周原地区七星河-美阳河流域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当地仰韶文化连续发展,到仰韶晚期达到了顶峰,遗址的数量和规模皆显著增加<sup>[34]</sup>。而龙山时代的统计结果与周原地区的调查结果不尽一致:本文统计分析显示,与龙山早期相比,龙山晚期遗迹的出现频率和数量似乎都有所下降;周原地区七星河-美阳河流域的调查则显示了龙山早期相对低潮,龙山晚期加速发展,遗址数量及规模都有比较显著的增长。另外,武功县漆水河下游调查发现龙山早期遗址12处,而龙山晚期仅有5处,且遗址规模也有所缩小<sup>[35]</sup>。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尚需进一步工作。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也与统计的样本数量较少有关。

需要指出的是,关中地区新石器文化发展规模阶段性变化的认识主要是基于对灰坑的统计分析而得出的,对于遗址规模的阶段性变化考虑较少,同时对于遗址规模的差异及遗址不同功能区可能对统计结果的影响考

虑较少。另外,由于年代数据的粗略,本文也没有考虑不同区域相同发展阶段可能存在的时间差异,而是一种较大尺度比较的结果。

## 二、周围地区新石器文化发展规模的考察

上面通过对已发掘遗址出土灰坑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新石器时代关中地区文化发展存在着显著的阶段性变化。那么,这种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是否也存在于其他地区呢,下面我们来考察一下关中周围区域的状况。

对于关中及周围地区仰韶文化的发展状况,笔者已有文章做了较为详尽的比较<sup>[36]</sup>,这里不再赘言。本文主要讨论龙山时代关中周围地区的状况。

统计结果显示,似乎以崤山为界,豫西地区东西两侧情况存在一定差异。崤山西侧为三门峡地区,灵宝铸鼎塬小区域的考古调查显示,在经历了仰韶晚期的低潮后,龙山早期重新崛起,遗址数量达到了12个,龙山晚期则又进入了低潮阶段,仅发现遗址4处<sup>[37]</sup>,这个结果也得到了后来进一步调查的证实<sup>[38]</sup>。崤山东侧的郑洛地区是考古工作比较密集的地区。经过多次调查与复查,郑洛地区目前已发现仰韶早中期遗址238处,仰韶晚期到龙山早期遗址357处,而龙山晚期遗址则更是达到了516处<sup>[39]</sup>。从遗址数量来看,龙山晚期较仰韶晚期-龙山早期有了显著的发展。小范围的伊洛河下游的调查资料显示,龙山早期文化发展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低潮,遗址的数量、规模较仰韶晚期有所下降,龙山晚期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高峰阶段,遗址的数量、规模都有显著增加<sup>[40]</sup>。(表八)最近洛阳盆地的考古调查也显示,与仰韶时代相比,龙山时代也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sup>[41]</sup>。

表八 豫西地区不同区域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情况

地区		仰韶早期	仰韶中期	仰韶晚期	仰韶文化遗址总数	龙山早期	龙山晚期	龙山文化遗址总数
铸鼎原地区		13	18	8	25	12	4	14
伊洛河下游	遗址	3	10	27	34 (3)	9	29	44 (10)
	总面积	1.7	46	66.26	(7.5)	21.8	97.3	(5.66)

注：括号内为具体期别不明的遗址数量及面积。

无论从遗址数量还是单个遗址面积等指标来看，晋西南地区（包括临汾和运城地区）龙山时代发展超过了仰韶时期。与仰韶晚期的 135 处遗址相比，晋西南地区已发现龙山早期遗址 280 处，龙山晚期遗址更是达到了 410 处，说明与仰韶文化相比，龙山时代晋南地区又有了进一步的稳定、连续发展<sup>[42]</sup>。而小范围的垣曲盆地的调查结果显示，经过了仰韶晚期的低潮后，龙山时代区域文化呈现出连续、稳定发展的特点<sup>[43]</sup>。（表九）

表九 垣曲盆地仰韶—龙山文化遗址数量、面积统计

	仰韶早期	仰韶中期	仰韶晚期	龙山早期	龙山晚期
遗址数量	12	39	26	34	38
遗址总面积	28.11	132.89	80.27	113.93	118.3

注：遗址面积单位为万平方米，具体面积不详的一律按 0.5 万平方米处理。

甘肃东部也是新石器文化发达的区域之一，目前已有较多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其中尤以泾水上游<sup>[44]</sup>、葫芦河流域<sup>[45]</sup>、牛头河流域<sup>[46]</sup>和西汉水上游<sup>[47]</sup>最为详细。调查资料显示（表一〇），单从遗址数量来看，一类以泾水上游、葫芦河和牛头河为代表，龙山时代以来区域文化出现了逐渐分散发展的趋势，遗址数量增多而规模缩小；另一类以西汉水上游为代表，龙山时代文化的发展规模远不及仰韶文化时期，在遗址数量、规模两方面都有所体现，龙山早期出现了一个

显著的低潮阶段，龙山晚期又有所发展。

表一〇 甘肃东部不同区域仰韶—龙山文化遗址数量

区域	仰韶早期	仰韶中期	仰韶晚期	龙山早期	龙山晚期
泾水上游	>30	100	200	多	>200
葫芦河	23	49	67	80	376
牛头河		12	24	42	41
西汉水上游	8	21	57	23	36

注：龙山早期即常山下层文化，龙山晚期即齐家文化。

通过对关中周围区域的介绍，我们发现关中周围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同样也存在着显著的阶段性起伏的现象，并且不同区域之间文化发展似乎还存在着此起彼伏的现象。

### 三、关中地区新石器文化发展阶段性原因的考察

在明确了区域文化发展阶段性起伏的特点后，我们来尝试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最直接的解释就是，文化也有一个产生、发展、繁荣和衰落、消亡的过程。当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自然而然就进入了比较衰落的低潮阶段。然而这个解释似乎难以解释在同一文化内部，为什么有些区域发展繁荣，而有些地区却陷入低潮。

这里以关中地区为例，尝试探讨关中地区新石器文化发展阶段性起伏及内部存在东、西差异的原因。



从自然环境的角度来看,关中东、西部确实存在一定差异。笔者认为,对于关中地区这种自然环境相对优越的地区来说,全新世以来的环境变化虽然会对人类产生一定影响,但是并不是引起该区域人类文化盛衰变化的驱动力量<sup>[48]</sup>,因此新石器时代关中地区文化发展的阶段性起伏以及东、西部区域差异似乎可以初步排除环境变化的影响。

那么,在排除了环境变化造成关中东、西部文化区域差异的可能性后,我们初步认为关中地区新石器文化发展出现东、西区域差异的原因至少有两种:一种是与区域自然资源有关,另一种与社会文化环境,即文化之间的互动态势有关。究竟是哪一种原因,我们试做分析。

在农业是最重要的经济活动的新石器时代,土地资源是当时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在当时比较粗放、原始的生产方式下,经过若干年耕作(目前似乎还不能确认新石器时代已懂得施肥)后,地力耗尽,农业产量下降,可能就需要寻找、开发新的土地资源。仰韶中期,关中东、西部由于快速发展,遗址数量众多,这则意味着人口密集,对土地等资源的消耗十分严重。当区域土地资源耗尽时,人群转移到其他地区,待资源恢复(即地力恢复)后再回来,于是这样就出现了关中东、西部发展的区域差异。

如何验证这种假说,目前还比较困难,这里试做分析。陶器与人群之间的关系很复杂,目前尚难以将陶器变化与人群流动确切对应,特别是同一文化内部。对于是否有人群的大量涌入,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从遗址数量考虑,与仰韶中期相比,如果关中西部仰韶晚期遗址数量有明显异常的增加,超过了正常的发展速度,那么就有可能有外来人群的加入;另一方面,从遗址的连续性来看,如果仰韶中、晚期之间文化连续性很紧密的话,似乎外来人群影响较小。还有,遗址叠置率的变化也能够反映生活的稳

定性高低,如果叠置率低,似乎有可能反映出存在外来人口的可能性比较大。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社会环境变化引起人群的迁徙从而出现了文化的区域差异。虽然,新石器时代仍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但人群之间对资源的竞争应是客观存在的。竞争有同一文化内部的,也有不同文化之间的,这里只简单讨论同一文化内的竞争。在竞争中失利的人群,要么继续留在当地,要么另寻栖身之处,而获胜的一方,则往往会占据失败者的资源、土地。无论表现为那种情况,一般不会造成人口数量的锐减,不会表现为遗址数量的急剧减少。

关中东、西部仰韶晚期到龙山早期遗址数量的稀少无疑反映了当时人口数量的急剧减少。同时,我们并没有在仰韶文化之外发现有新文化因素大量涌入的情况,加之关中地区并不处于文化接触的前沿地带,所受外来文化的直接压力和影响十分有限,那么,似乎也可以初步排除关中东、西部仰韶晚期到龙山早期的低潮阶段与社会环境变化有关。

#### 四、结 论

通过对灰坑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一方面,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不同阶段文化的发展规模存在着比较显著的阶段性变化,其中存在着龙山早期这样一个显著的文化低潮阶段;另一方面,关中地区内部文化发展的东、西差异从仰韶文化开始就已存在,并且一直延续到龙山时代。

还有,对关中周围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规模的统计分析也显示,文化发展的阶段性起伏也同样存在于这些地区,并且似乎不同区域之间文化发展还存在着此起彼伏的现象。

那么,如何认识这种区域文化发展此起彼伏的现象,它究竟是何种原因造成的,是文化发展的自然过程呢,还是可能与社会文化或环境、资源变化引起的人口流动有关,

这些都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

- [1]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陇县原子头.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 [2] 史一甜. 千阳丰头遗址仰韶文化晚期遗存分期及相关问题研究. 西北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2007.
- [3]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 陕西麟游县蔡家河遗址龙山遗存发掘报告. 考古与文物, 2000, (6): 3~16.
- [4]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 宝鸡关桃园.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
- [5]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宝鸡福临堡.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3: 7~168.
- [6] 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82级实习队. 宝鸡石嘴头东区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 1987, (2): 209~226.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 宝鸡石嘴头遗址1999年发掘简报. 考古与文物, 2008, (2): 10~24.
- [7]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专业. 扶风案板遗址发掘报告.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 陕西扶风案板遗址(下河区)发掘简报. 考古与文物, 2003, (5): 3~14.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 2007-2008年度案板遗址龙山时代遗存发掘简报. 见: 西部考古(4).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9: 23~36.
- [8] 西安半坡博物馆. 陕西岐山双庵新石器时代遗址. 考古学集刊(3).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3: 51~68.
- [9] 西安半坡博物馆. 陕西岐山王家咀遗址的调查与试掘. 史前研究, 1984, (3).
- [10] 雍城考古队. 陕西凤翔县大辛村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与文物, 1985, (1): 1~11.
-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武功发掘报告—浒西庄与赵家来遗址.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8: 24~28.
-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武功发掘报告—浒西庄与赵家来遗址.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8: 115~117.
-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六队. 陕西蓝田泄湖遗址. 考古学报, 1991, (4): 415~448.
- [14]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 高陵东营.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 [1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沔西发掘报告.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63.
- [16]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临潼零口村.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4.
-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临潼白家村. 成都: 巴蜀书社, 1994.
- [18]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陕西临潼零口北牛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与文物, 2006, (3): 15~28.
- [19] 西安半坡博物馆,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 临潼姜寨.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8: 15~357.
- [20] 西安半坡博物馆. 陕西临潼康家遗址第一、二次试掘简报. 史前研究, 1985, (1): 56~67.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陕西临潼康家遗址1985年发掘简报. 考古与文物, 1988, (5-6): 214~228.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陕西临潼康家遗址1987年发掘简报. 考古与文物, 1992, (4): 11~25. 刘莉, 阎毓民, 秦小丽. 陕西临潼康家龙山文化遗址1990年发掘动物遗存. 华夏考古, 1990, (1): 3~24.
- [21] 西安半坡博物馆等. 渭南北刘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调查与试掘简报. 考古与文物, 1982, (4): 1~10. 西安半坡博物馆等. 渭南北刘遗址第二、三次发掘简报. 史前研究, 1986, (1-2): 111~128.
- [22]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华县泉护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 张宏彦. 渭水流域仰韶文化分期问题. 文物, 2006, (9): 62~69.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201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调查发掘新收获. 考古与文物, 2011, (2): 31~39.
- [23] 张宏彦. 陕西华县梓里遗址发掘纪要. 文物, 2010, (10): 34~42.
-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工作队. 陕西华阴西关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考古学集刊(6).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52~62.
-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工作队. 陕西华阴南城子遗址的发掘. 考古, 1984, (6): 481~487.
- [26]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200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调查发掘新收获. 考古与文物, 2010, (2): 3~13.
- [2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工作队. 陕西华阴横镇遗址发掘报告. 考古学集刊(4).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1~39.
- [28]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陕西合阳吴家营仰韶文化遗址清理简报. 考古与文物, 1990, (4): 18~27.
- [29]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 元君庙仰韶墓地.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3.
- [30] 张宏彦. 渭水流域老官台文化分期与类型研究. 考古学报, 2007, (2): 153~178.
- [31] 张小虎. 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发展的区域差异及经济状况的统计分析. 待刊.
- [32] 赵春青. 郑洛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的演变.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陈星灿, (下转44页)

提到的“兽下颌骨”也是如此，不另注。

[12] 女性用牲数量较多或可解释成两性于劳动中的分工不同（女性从事养殖业）在墓葬中的反映。但从整个墓地用牲并不普遍，用牲在合葬墓中较多，女性用牲比例较小等情况来看，这种解释显然不合理。

[13] 同 [1]: 292.

[14] 同 [1]: 294.

[15] 参见下表:

	男性		女性		异性		儿童	不明	单人葬	双人葬	总计
	单人葬	单人葬	双人葬	双人葬	三人葬	单人葬	单人葬	小计	小计		
墓室面积 (m <sup>2</sup> )	2.35	2.34	7.99	3.82	5.34	1.25	2.03	2.15	5.21	2.73	

[16] 有、无用牲墓的平均墓室面积分别是 4.46 平方米和 2.33 平方米。

[17] 更底层的也许应该是那些没有任何随葬品的墓主

(上接 30 页)

刘莉, 李润权等. 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伊洛河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 考古学报, 2003, (2): 161~2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 河南洛阳盆地 2001~2003 年考古调查简报. 考古, 2005, (5): 18~37.

[33] 张天恩. 渭河流域仰韶文化聚落状况观察. 见: 中国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 (第 1 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102~112.

[34] 周原考古队. 陕西周原七星河流域 2002 年考古调查报告. 考古学报, 2005, (4): 449~484. 周原考古队. 2005 年陕西扶风美阳河流域考古调查. 考古学报, 2010, (2): 207~228.

[3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功队. 陕西武功县新石器时代及西周遗址调查. 考古, 1983, (5): 389~396.

[36] 张小虎. 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发展的区域差异及经济状况的统计分析. 待刊.

[3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 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等. 河南灵宝铸鼎塬及其周围考古调查报告. 华夏考古, 1999, (3): 19~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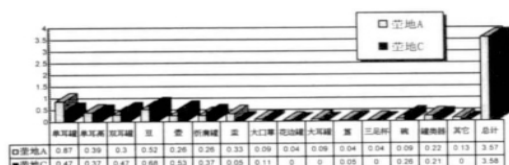
[38] 魏兴涛, 张小虎, 胡小平等. 河南灵宝铸鼎塬史前聚落调查取得重要成果. 中国文物报, 2007-06-29 (2).

人。但由于这些墓葬的文化属性不能判定, 本文暂未能把它们考虑在内。

[18] 王乐文. 朱乐开沟遗址出土的两类遗存. 边疆考古研究 (3).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44~52.

[19] 茆地 A 与茆地 C 的平均墓室面积分别是 2.07 平方米和 3.52 平方米。

[20] 参看下图:



[21] 同 [15] .

(责任编辑: 方燕明)

[39] 赵青青. 郑洛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的演变.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40] 陈星灿, 刘莉, 李润权等. 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伊洛河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 考古学报, 2003, (2): 161~217.

[4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 河南洛阳盆地 2001~2003 年考古调查简报. 考古, 2005, (5): 18~37.

[42] 国家文物局主编. 中国文物地图集 (山西分册).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 2006.

[43]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 垣曲盆地聚落考古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19~408.

[44] 李红雄. 试论泾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 考古与文物, 1988, (3): 41~52.

[45] 李非, 李水城, 水涛. 葫芦河流域的古文化与古环境. 考古, 1993, (9): 822~842.

[46]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 牛头河流域考古调查, 中国历史文物, 2010, (3): 4~23.

[47]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 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8.

[48] 张小虎. 中全新世黄河流域不同区域环境考古研究. 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0.

(责任编辑: 方燕明)